

版权产业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

□ 范军

当前,版权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词汇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前不久,在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办的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期间,国家版权局发布了《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2007年—2009年)》报告。同时,国家统计局也颁布了新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别发布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报告》和《上海市创意产业报告》。在许多场合不断有人问起,版权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三者之间又有哪些不同?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上,观众在体验台体验最新的网页游戏。李苑摄

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有不同界定

联合国三大组织分别推出分类标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活动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果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或促进因素,而文化资源稀缺性和重复利用性的特性,使得文化资源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无论是从文化需求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供给的角度,其对扩大内需,进而对经济增长有拉动和提升作用。“文化产业”的概念也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各国政府把制定“文化产业”政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积极推动下,自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和瑞典首次进行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研究以来,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开展了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研究。为建立统一的版权产业调查与分析规则,指导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开展的版权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量化研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03年发表了《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调查指南》,按照版权在相关产业中的作用大小,把版权产业分为“核心版权产业”“相互依存的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非专业支持产业”等四类。版权在这四类产业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各有不同,它们对于版权保护的依赖程度逐渐递减。

但由于世界各国在规划和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侧重点、落脚点、开展的范围、发展的路径不同,对“文化产业”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使用了不同的称谓,譬如“版权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这些概念和界定更多地体现了世界各国各自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导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5年建立了文化产业分类标准,于1986年制定了统计框架,并分别于1993年和2009年作了进一步修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产业定义为,以艺术创造表达形式和遗产古迹为基础而引起的各种活动和产出,具体包括文化遗产、出版印刷业的著作文献、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频媒体、视听媒体、社会文化活动和体育和游戏、环境和自然等十大类别。

联合国贸发大会专门设有创意产业部,把创意产业定义为那些依个人创意、技能和天才,通过挖掘和开发智力财产以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根据这

个定义,创意产业包括广告、建筑、美术和古董交易、手工艺、设计、时尚、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以及电视、广播等诸多部门。他们认为创意产业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产业,而是适应新的产业形态而出现的创新概念。

版权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在我国发展的状况

从2007年开始,国家版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委托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我国开展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测算。测算方法是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分类标准,对我国版权相关产业进行量化分析,包括行业增加值、就业人数、出口额三个经济指标。通过对2004年、2006年—2011年的调研显示,我国版权相关产业初具规模,版权对国民经济已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版权相关产业的行业增加值年增长率高于GDP年增长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全部版权相关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较高,核心版权产业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有较大上升空间。

在2000年以前,我国对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基本处于研究探讨范畴,基本上把文化产业等同于文化创意产业。进入21世纪,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我国文化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000年10月,首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

部署,明确划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2003年,中宣部会同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文化产业统计课题研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化产业定义,即: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并于2004年编制出台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和《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修订完成并于2012年7月2日印发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此次修订调整了类别结构,增加了与文化生产活动相关的创意、新业态、软件设计服务等内容和部分行业小类,减少了少量不符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定义的活动类别。

我国版权产业概念和界定完全脱胎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分类标准,而我国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有其特定的概念和界定。版权产业与文化产业称谓不同,各有各的出发点与侧重点,也各有各的作用与意义。但主体内容类似,外延范围存在着近似或相同、交叉或覆盖的关系。文化产业需要借助于各种媒体向大众传播,而以法律为基础的版权制度为其传播与创新提供了合法的保护。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文化创意、广告设计、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等相关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如果没有版权保护的制度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少产业生存发展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陆学艺的“三农”绝唱

□ 杨耘

陆学艺先生的《“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原定于今年五六月间出版。正在出版工作紧张之际,陆学艺先生不幸于2013年5月13日在京辞世,噩耗传来,大家不胜悲痛!

“做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这是陆学艺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所有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动力。陆学艺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社会学理论、社会结构研究,留下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等扛鼎之作。学术界评价陆学艺的学术成就:首先,他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农村、农业问题有重大的真知灼见,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城市化,做出了一般研究者难以望其项背的贡献。第二,他对中国农村,特别是粮食生产长期关注。由于他的及时提醒,中央长期关注粮食生产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第三,在社会学方面建树卓著。他以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而享誉中外,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学界中堪为佼佼者,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方面的学术贡献巨大。

30多年来,陆学艺到过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同农业的多个部门打交道,发挥智囊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1979年9月中旬,陆学艺和两位同事到安徽调研后,顶着有悖中央文件的压力,写成了研究报告《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于当年11月3日刊发在《未定稿》增刊,虽然共印了200份,但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也看到了。后来,万里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最早为包产到户做宣传的文章,是社科院同志写的。这份增刊传到甘肃省,省长李登瀛专门转给省委书记宋平,并在刊物上写了如下一段话:“这份材料是从北京捎来的,其中社科院写的那一篇要重视,同文件的说法不一致,值得我们思考。”可以说,这份调研报告有力地助推了“包产到户”的改革实践。

再如,陆学艺出于对粮食安全的忧虑,1986年4月写出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指出农业发展的11大制约因素,主要是两条:一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几年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在几个重要方面削弱了;二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的挫伤。

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找中央领导同志座谈时指出:“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粗略估计一下,到2000年,以12亿人口每人800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9600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100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

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见《“三农”续论》第35页)。此后,中央专门进行了讨论,责成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利部、电力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即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共同研究,提出今后10年增强农业后劲的建议。

他最早倡导县域综合体制改革。进入新世纪,陆学艺敏锐地提出,我国农村必须要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改革。他认为,“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障碍。为此,他提出了根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三项重要举措:改革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改革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和实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

2006年,重庆出版集团为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决定出版《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书系》,陆学艺欣然应诺担任这套书系的总主编,该书系迄今已出版近60种。2008年,陆学艺答应将自己的第五部“三农”文集交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这就是《“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一书。他为本书写了非常有分量的“前言”、“后记”,亲自审读了书稿校样、版式,并对图书封面设计提出了修改意见。甚至,还不厌其烦地审读了图书腰封和封底文字。他去世的十多天前,还与编辑通过电话讨论图书的宣传事宜。

应当说,这本书的重要出版元素,陆学艺生前都看到了。但让人痛惜的是,他没能看到这本书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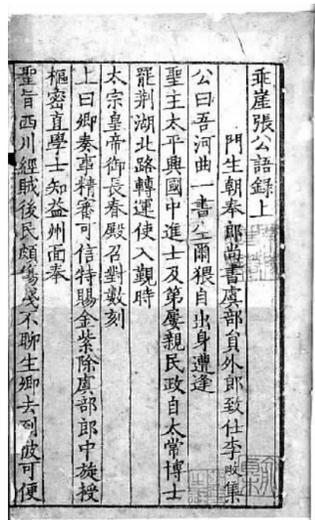
“不深读‘三农’就不懂得中国”。《“三农”续论》是一部关系重大的实践学说,其投资价值、学术品位与实用性高度融合。非常适合参与国家改革发展进程的各级党政干部、“三农”问题决策者、管理者、“三农”工作者、社会学界阅读,对“三农”问题有兴趣的广大读者也将大有收获。



“全国古籍普查拾珍” ⑩

宋绍定三年 钱塘俞宅书塾刻本《乖崖张公语录》

□ 徐忆农



南京图书馆《乖崖张公语录》二卷,宋李昉、宋绍定三年(1230)俞宅书塾刻本,曹元忠跋。卷下题:门生朝奉郎尚书虞部员外郎致仕李昉。卷末木记题:绍定庚寅刊于钱塘俞宅书塾。避宋讳,“完”“慎”等字缺末笔。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有刻工:通、中、免。

张咏(946—1015),字复之,谥忠定,宋郟城(今属山东)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枢密直学士,曾知益州、杭州、昇州、陈州等地,北宋士大夫的议论甚至将他与赵普、寇准并列,认为是宋兴以来功绩最大的名臣之一。张咏尤以治蜀著称,蜀民把他比作诸葛

孔明。张咏在自己画像上题赞云:“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故被人称为乖崖。《乖崖张公语录》由张咏的门人李昉(约952—约1053)编纂,主要记载其治蜀期间可以垂于后世的言行。张咏语录为《五朝名臣言行录》《事实类苑》《通水燕谈录》《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題》等书引用或著录,但名称与卷数,宋人记载颇不相同,可见当时流布广泛。张咏语录目前存世宋版有两种系统,一种为张咏文集所收“语录”卷,另一种为单行本。现知上海博物馆藏《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集》一卷,宋嘉定年间郭森刻本,曾选作民国影印《续古逸丛书》的底本,其中第十二卷为“语录”;国家图书馆藏《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集》一卷,宋咸淳五年(1269)伊陵崇阳县斋刻本(配明赐书楼抄本),卷十二“语录”为抄配本。南京图书馆藏《乖崖张公语录》,可以说是现存唯一的宋刻宋印单行本张咏语录。

此本上卷为张氏言行记录,下卷为“公与诸刘学士帖”及韩绛、王安石等多人的题跋,另录有《王文正遗事》《梦溪笔谈》等书中所载张咏事迹。“潭州刘学士”指刘师道(960—1014),字损之,宋东明(今属山东)人,雍熙进士,历任彭、润、潭诸州知州,累官枢密直学士。张咏文集又录有“寄潭州刘郎中(师道)”诗,说明二人交往密切。从现存宋版看,张咏文集所收“语录”仅19则,而单行本《乖崖张公语录》所收达65则,二者相较,单行本记事更为详备而有序。张咏语录今天读起来也并未“过时”,如张咏说:“大凡举人,须学好退者,……莫学举者,举者能曲事谄媚,求人知己,净举之必能利才好利,累及举官。”这种推举人才观念,对当代人才制度建设或有启示意义。单行本《乖崖张公语录》刻于杭州,当时全国有浙、蜀、闽三大刻书中心,浙本居首,而浙本又以杭州本最著名,这部《语录》就是钱塘(今杭州)俞家书塾所刻,字体介于欧阳洵和褚遂良之间,用纸是细腻的皮纸,墨色至今仍均匀有光泽,体现宋代杭州本典型风格。国家图书馆藏宋咸淳杭州廖氏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被称为“传世神品”,而这部《语录》可与之媲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著录此本,珍贵可知。此宋本钤有“俞贞木”“郑之铨印”“郑

西典阁”“松陵史蓉庄藏”等印。俞贞木(1331—1401)初名桢,字有立,元末明初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著名学者俞瑛(1253—1314)之孙。通经史,工古文辞,善小楷,俞瑛撰《周易集说》由其缮写刊行。俞氏藏此本递经郑之铨、史开基(号蓉庄)等家收藏,又转归苏州顾氏过云楼。书末有曹元忠细阅顾氏藏书后的题跋。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号君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光绪举人,曾参与“公车上书”,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曹跋末所署“宣统丁巳八月甲申”,实为民国六年(1917),当年夏季虽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事件,但至八月事件已平息多日。据《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傅增湘先生民国壬子年(1912)二月观此书于苏州顾鹤逸家,而民国壬戌年(1922)王国维先生撰《两浙古刊本考》也著录此书,并称“吴门顾氏藏”。1991年秋,南京图书馆购藏顾氏过云楼藏书541册,宋版《乖崖张公语录》就是其中的奇珍佳本之一,现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作者为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新书短评

大国的艺术节

□ 包心鉴

在中国艺术节办到第十届的时候,我们终于有了一部研究艺术节的学术专著。

世界上有很多的艺术节,以至于被归纳评出了“世界十大艺术节”,他们的特色,经验常被作为中国艺术节借鉴、努力的样板。但是,以往的研究,宣传都没有意识到国际上的这些艺术节与中国艺术节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简单说,这十大艺术节都是城市艺术节,一直由一座城市举办,而中国艺术节则是由不同的城市轮流举办。这两种不同的办节方式内涵大不相同。

中国艺术节是国家级群文活动,在国内各省市之间流动举办。这样的一种举办方式当然有其独特的考虑。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风情也千差万别。艺术节推动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各地轮流举办有助于带动不同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另外,让更多的人享受艺术节带来的欢乐,感受艺术的熏陶也是轮流举办的合理之处。

当然,这样的举办方式也给主办方带来了挑战。在一城一地固守举办的活动中,传统更易形成并保持。绵延到一定岁月之后,一届届活动便会

累积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代代相续,欣欣向荣。而易地举办则有很大的麻烦,每一次都由不同的人来操办,对举办地、操办者来说,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临时工作,活动的专业性难以保持,传统时时而变,不易完善。参加艺术节的人不会有旧地重游的温馨,也很难体会绵延不绝的人文底蕴。比如,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济南举行,而济南有2600年的建城史,这份悠久的历史史多大程度上能与艺术节融为一体,这是个疑问。令我们高兴的是,“十艺节”主办者们拿出了《济南筹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研究》这样一部对中国艺术节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它是为济南“十艺节”而展开的研究,但它关注和涉及的问题却是中国艺术节更广阔的内容。

中国艺术节肯定会一届届延续,如何把握中国国情,把艺术节办成一个万众瞩目、传统丰厚的艺术盛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济南筹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研究》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意义重大,这是要对其表示赞赏的。

《济南筹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研究》 韩圣喜、石兆宏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